

导 言

0.1 论题研究的理论背景和现实意义

0.1.1 论题研究的理论背景

由学理而言，真实世界发生的现象在学科研究方面都是多维度的。因此可以说，对事物表象所内含着的综合性特征进行解构是各类边缘性学科建立的基础。对城市现象进行的经济学研究便是其中非常具有典型性的边缘性研究科目之一。由学科的历史发展角度分析，自城市实体作为研究对象列入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范畴开始，城市科学便被解构为地理学、社会学、建筑或规划学、人口学以及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综合。由作为学科研究出发点的基本概念范畴的界定便可见其中一斑。其中，地理学将城市视为由人类改造和组织自然环境而成，体现地域特征的复杂地理系统；社会学将城市定义为由人口群体、各类技术机构和设施以及行政管理系统构成，具有独特结构的社会组织形式；建筑规划学界定将为为居民提供形体环境的建筑形态的空间组合。学科的交叉和互补体现了城市研究的综合性。城市科学成为对城市系统进行多角度研究的学科系统。在此学科系统中，经济学研究具有前向地位。从城市实体的形成、发展及演变过程的溯源看，决定因素首先是经济性的。一

部城市发展史完全可以抽象地概括为是对城市地域经济关系和地域经济现象空间运动的描述。可以认为，经济学研究是城市学科系统的“系统动力学”。

然而，自威尔伯·汤普森的标志性著作《城市经济学导言》（1965）出版，城市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却长期居于萌芽和混沌状态。这充分体现在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兼容和基础理论的不规范两个方面。首先，西方城市经济学对城市对象的研究遵循问题求解的应用研究模式。在问题求解的过程中，巴顿意旨去解决城市问题（1976）；山田浩之欲探讨决定城市空间结构的社会经济原因以及相应的公共政策（1977）；诺思的界定是研究城市内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空间分布（1970）；而沃纳·赫希认为应研究城市地区特有的经济活动。暂且勿论“城市问题”概念本身内涵和外延所具有的模糊性。西方城市经济的应用研究，即使在研究对象的具体内容和空间范围两个方面也体现出明显的不兼容。由此，问题求解模式无法建构起相互内在一致的城市对象分析逻辑。最终导致城市经济学科研究的分化和各自侧重。研究实践表明，西方学者在城市经济研究中，已然形成：（1）研究城市区位与经济布局；（2）研究城市经济社会问题；（3）研究城市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体系；（4）研究城市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等几类重要倾向。研究内容的多元化是自城市经济学科诞生以来，长期未能形成一以贯之的基础理论和有效分析工具的根本原因。

作为贯穿学科研究的核心理论必须能够满足整体性、动态兼容以及内在逻辑连续统一的要求。城市作为具有结构特征的空间组织，其本身就是一种空间的结果。城市应该是人类活动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统一。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是城市经济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独立存在的理由。此外，城市经济学特有

的，譬如关于城市经济增长的理论、关于城市规模经济及外部性的理论、关于城市化和区域演变机制的理论以及关于城市聚集经济的理论等基本理论都毫无例外地体现着空间经济的属性。山田浩之更是明确指出：城市土地利用与空间结构理论接近城市基础理论的核心。因此，城市系统的空间研究对更新和发展城市基础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完整的城市空间系统由域内和域外或域间两个子空间系统构成，需要在此提及的是，两个系统的空间运动规律以及对城市实体产生的空间意义大相径庭，但从总体上讲，两系统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空间经济联系。两个系统的空间运动相互对立统一。

0.1.2 论题研究的现实意义

在战后持续的经济衰退危机的重压下，世界经济分工格局开始进行结构重组。跨地域的资本投资尤其是跨国公司等经济组织形态的兴起，推动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物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流动和空间分布逐渐突破了传统的地域限制，区域间的相互作用程度增强。因之，城市和区域空间演化的内在机制更加错综复杂，包含了不同范畴和不同层面的各种因果过程。在各类空间演化的过程中，经济机制具有主导作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宏观背景下，经济领域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在产业方面，产业的地域分工基础脱离了传统的资源禀赋决定模式。产业与产业组织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日益复杂。产业的内部交易联系取代了以往占主导地位的水平型分工基础上的产业间的交易联系。从而，产业组织结构关系日益紧密，外部交易内部化，使得空间市场结构出现区域化发展趋势。城市作为现代工业的空间载体，其产业组织职能日益突出；在贸易领域，以跨国公司代表的新型的投资、生产和贸易体系日臻完善。贸

易已担负起组织和协调地域生产力的职能，地区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区域的功能一体化系统已然形成。因此，以产业和贸易为角度，探讨城市外部空间结构形成和动态演变的一般性理论，对生产资源的空间配置和前瞻地规划区域生产力布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中国，受限于长期居于主导的农业社会自然经济模式，自给自足的地域供给和消费体系长期处于主流位置。地域分工被严格限制于行政辖区的范围内，生产力的空间布局是以省、市、县等不同层次的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各经济区之间的独立性非常强。多地区、多形式的地域组合或分工几近绝迹。跨地域的统一市场无法形成，地域生产布局依靠非经济的政治和制度手段进行组织，区域间内在的空间经济联系被条块模式割断。尤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兴起的平衡增长的大推进工业化战略下，无视幅员辽阔，工业区位条件空间差异明显的国情而均匀布局工业城市，各省甚至各县依靠自身的资源、资金和历史经验，建立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受制度因素影响，由 1965 年“三五”时期开始，中国经济重与世界隔绝开来，从经济布局看，产业的地区布局分散，组织化程度降低。尤其在 1970 年“四五”计划时期，“五小工业”模式的制度化推广致使区域产业结构更加雷同，加剧了产业规模不经济。例如，资料表明，截至 1970 年，在全国 20 多个省、市普遍建立了小型动力或机械厂，90% 的县创办了农用机械厂和小化肥厂，全国 300 多市县兴办了小钢铁厂，且钢铁产量年均递增 150% 以上。直至 1972 年，以从德、日引进轧机为开端，我国大型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引进工作才开始重新启动。从此，以空间集中为标志的规模化生产形式以及相应的经济组织才重新在相关区域出现。产业布局的分散化造成空间集聚效应的严

重丧失。因此，探索由经济联系衍生的城市经济区的空间组织，研究城市在产生、成长及与外部经济联系发展过程中的空间运动规律，对中国的城市化和生产力的宏观布局具有积极意义。此外，中国经济运行体系中的另一个现状是城市化水平相当低。由指标比较来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仅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实水平相去甚远，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平均水平，并且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存在着严重的地域不均衡现象。究其原因，这种现状是由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实施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发展战略造成的。这种现状不仅造成我国宏观经济的区域失衡，更重要的是，它严重阻碍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在我国及时地进行城市外部空间结构演变规律的相关研究，非常有利于及时确认并发挥城市区域空间的生产力作用，并对中国的城市化建设以及在对中国西部开发过程中保障区域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城市基础体系建设等方面产生积极的政策建议作用。

0.2 论题的研究角度、理论架构与创新

0.2.1 论题的研究角度与理论框架

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是对城市地域系统内的空间功能分异、整合及空间组织结构演化的理论研究。就空间范围而言，城市空间研究包括域内（微观）和域外或域间（宏观）两个层面。两者分别形成城市域内和域外两个具有独立特征的空间组织和空间运行体系。论题关涉的城市外部空间结构研究，即是从区域宏观层次着手对城市自身体系及与所在区域内其他城镇体系的空间关系与经济关系的研究。

中心城市是城市区域空间体系的核心。从某种意义讲，以经济关系联结的城市区域可以表示为中心城市极化效应和回流效应的矢量集合。集聚能力和扩散能力是体现中心城市规模与实力的两个侧面，同时也是城市区域空间范围的决定因素。因此，城市外部结构的空格外延可以描述性的表示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节点以经济关联城镇为组织节点的城镇网络群。这个网络群应具备规模结构、职能结构和布局结构的多重结构均衡特征。当已经形成的初始结构受到外生的经济或制度因素影响，则城市网络结构的稳定性遭到破坏，城市外部经济组织在地域空间的投影——城市群的布局结构发生变异，并向新的多重结构均衡演进。此种城市外部空间的均衡——非均衡——均衡的实现过程，即是城市外部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

(1) 地域劳动分工与城市的产生和成长

地域劳动分工是整个区域经济的空间组织问题。在分工理论研究的两条主要线索中，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视分工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为外生给定。在此前提下，通过供求均衡分析求解生产力与经济体系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分工理论和阿仑·扬格（Allyn Young）的研究是生产率意义上的。其理论线索是求解劳动分工及专业化水平如何内生的提高生产率。扬格定理扩充并确证了斯密“市场范围限制劳动分工”逆命题的成立；同时明确提出：分工和专业化将产生递增报酬。扬格命题不仅显示了一个市场范围扩大→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升→市场范围继续扩展→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再次提高的动态循环递增机制；而且表明存在着市场规模和市场范围与分工程度相互决定的经济网络效应。

依据扬格的网络效应命题。城市具有分工网络的空间节点

属性。分工和专业化不仅可以解释城市产生的原因；其还是决定城市地域规模、中心市场辐射范围以及城市经济增长根源的合理解释。据此，可以逻辑地推论出，凡能够遵循或符合分工与市场两者循环递增机制的城市地域将得到较快的发展，反之，城市地区将趋向衰亡。这可以归纳成为城市生命周期的内生分工决定理论。

分工与交易费用的冲突是城市产生的根本原因。若将由专业化和分工演进引致的产品种类的繁复及迂回生产链条的延长，纳入空间研究范畴。假定运输技术固定不变或运输效率提高的时间周期较长，则生产和交易活动的空间集聚是提高交易效率，抵消由市场扩大产生的交易费用（如交易信息的搜集和处理费用、市场协调费用等）的有效手段。上述机理在城市经济学上的逻辑结果可以描述为，城市地域空间的分工日益细密化，交易规模增加，空间集聚成为分工的内生结果。由此，空间统一的集中交易区，成为早期城市外部空间内倾的凝聚状结构模式。

我们可以将古典的农业区位论视为对城市的产生及早期城市外部空间形态的一种实证。屠能在对竞争性农业土地空间均衡配置的研究中，引问，如果农业生产方式（以作物种植种类及生产供给数量的选择来表示）已是最优化的，则城市地域外部的生产空间将如何安排（Von Thunen, 1826）。若撇开农业生产对土地和自然条件的较强依赖，在运输成本与距离成正比的假定下，将形成环绕消费市场区（交易需求中心）的生产区位的空间密集分布。这种集中交易分散生产的区位系统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条件下的中心地形态。这种自给自足的孤立国模式，既是城市外部空间结构的初始形态，也是地域劳动分工演化的出发点。

(2) 城市区域性产业、贸易体系与城市外部空间结构的形成

从理论上讲，任何城市的空间意义都是区域性的。极端的讲，在不存在交易成本的理想空间中，城市的辐射范围是无限的，空间距离的衰减效应失效。但是，地球是一个自然空间，地表资源分布非均质，在要素流动存在空间成本的现实假定下，生产区位将反映初始要素资源赋存的空间地域差异。这是地域生产专门化体系形成的物质基础。

现代城市是以产业经济为特征的。城市通过基础产业的产品输出和服务功能的扩散来渗透它的区域影响，实现其城市职能。在自然空间体系中，城市之间尤其是相邻城市的辐射影响区域，在空间上可能出现完全分离（即相互独立）、相互重叠和相互交叉等三种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的或然形态；在经济空间体系中，城市间通过输出型产业或服务的互补性，即通过城市之间基础产业关联链交互作用。这种互补经济的空间联结是通过产业贸易，尤其借助产业内部对中间产品的贸易形式加以实现。作用空间的经济联结是由内在经济关系决定的，因此，其空间联结往往能够逾越自然毗邻空间的连续作用模式，甚至出现“飞地”（即长距离贸易联系）的联结模式。

还应阐明的是，经济的地域联结是形成功能一体化经济区，即城市外部关联网络结构的空間基础。城市区域外部空间的范围及其最终的结构形态，将最终取决于中心城市（或首位城市，尽管两者并非等价，但两者的研究意义是相同的）的经济实力或集聚规模以及经济区内城市的职能结构和规模结构。

(3) 主导产业的演替与城市外部空间结构的演变

城市外部空间结构作为城市对外经济联系的空间映射，必然是动态性的。其将随着城市区域经济结构的重组发生演变。

山田浩之即以城市产业结构的变迁作为阐释城市成长与衰退的经济逻辑。主导产业的演替是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标志。同时，主导产业要素（劳动、资源→资本→知识技术）密集形态的演替是工业化进程以及经济结构演化的物质反映。在不同要素密集形态的产业主导阶段内，城市经济的主要对外联系方向各异。在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居城市主导地位时，城市外部经济往来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进行选择，在产业非均衡扩散的空间约束下，空间结构呈点—轴模式的线性带状分布形态；在技术密集产业主导阶段，即后工业化期，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摆脱了实物经济的空间依赖。城市的经济联系遵循利润极大化准则，将充分扩大市场区规模，空间结构呈中心模式散布状态。需提及的是，城市外部空间结构的最终形态也是域内城市空间博弈的结果，即城域外部结构的最终形态是交互作用地区的异向扩散力的博弈均衡。

0.2.2 论题研究对构建城市空间经济理论重心和研究范式的积极意义

萌生将空间问题作为本书选题和研究对象的念头，是基于作者在近几年中对城市或区域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一些思考。诚如艾萨德所言，区域经济学将成为现代经济学体系中最有生气的一门应用学科。若排除掉具体程度上的差异，可以说，事实已经如此或即将如此。规律表明，任何理论都落后于实践，仅是对实践的升华和总结。但寻找规律性毕竟是研究者的使命所在。因此，本书选题和写作的立意即是力求深入，寻本求源，探索学科规律中最为核心的解释性理论。综合所学，作者以为，区域科学的核心是空间运动，而空间运动的核心仅是两个字：演变。“三生万物”的中国古代道旨正是寓一

切现象于演变之中解释世界的。因此，本书的研究初衷，旨在由城市点域出发总结空间运动和演变的规律性，将所有围绕城市区域运动的空间现象从经济学角度统一在一个内在逻辑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之中，并以此试图构建在经济系统动态空间均衡基础上的城市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重心及其研究范式。

检索现有的关于空间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可知，在这方面是相对薄弱的。从整体上讲，目前，对微观城市内部和宏观城市经济区域布局的空间研究是比较成熟的。在上述两条研究的具体线索上，最具典型性的是以屠能和勒施为代表的古典市场交易区理论；在该领域近现代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内部空间研究成果包括菲特尔的交易理论、阿朗索（Alonso）的空间价格级差理论、米尔斯（Mills）的边际效用理论以及以迪克伊（Dickey）、布洛齐（J. Brotchie）和卡斯特（M. Castells）等代表的后现代社会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型理论；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区域空间理论包括戈特曼（J. Gottmann）、伊萨德（W. Isard）、胡佛（Hoover）以及洛斯通（Rosstong）、弗里得曼（Friedmann）、迈吉（T. McGee）、赫尔佐戈（L. Herzog）等代表的关于城市带或城市群的城市区域集合空间体系的各种描述理论。此外，对城市内部和宏观区域的空间研究在与现代经济学的前沿理论相结合的基础上出现了诸多新的研究趋向。例如，借鉴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和工具，在空间运动研究中已经形成产业组织分析、空间博弈分析、经济周期分析、经济结构演进分析等多项理论研究的逻辑线索。作者认为，城市作为一种实体从雏形开始即已具备空间特征，而且事关城市的一切问题都能够在城市地域范围内产生空间投影。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将城市简单地定义为是一种具有结构特征的空间组织系

统，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空间统一。研究范式是从应用角度对能够充分体现上述理论研究目的和研究逻辑的分析以及应用研究工具的具体选择。根据作者在前文中对城市经济学研究重心的论述和基本观点，在目前情况下，城市空间经济领域研究范式的缺陷主要体现在：首先，目前对地域经济中空间现象的研究多集中在微观城市内部和广义或宏观的区域范围这两个具体层次。对于将所有城市空间现象纳入一个完整的动态演变体系中，即对空间运动现象中宏观空间和微观空间两者有机结合的理论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从而对城市外部空间结构形成与演变规律性的认识是相互割裂的。因此，在理论应用中，多见的仍是两个层次的理论在空间现象研究中的相互解释，缺乏一致性。其次，在已有的对空间运动和空间现象的研究成果中，多属于以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为理论基础的描述性研究，对空间运动形成和演变规律的较为系统的核心经济学解释性理论研究尚属于空白。

因此本书认为，研究城市地域系统空间组织结构的运动规律应由介于空间经济学微观区位理论和宏观布局理论系统之间的中观层次切入。由城市点域的空间形成出发，通过对城市点域→线域→面域的空间演变规律性的研究将所有城市空间现象从经济学角度逻辑一致地统一在动态兼容的理论框架体系之中。这种研究范式既是对区域理论的微观基础的研究，也是对区位理论的动态演绎。通过将中观层次的城市空间现象动态化，城市自身体系及与所在区域内其他城镇体系的经济运动与空间运动两种空间关系相互结合，有利于揭示城市经济区域形成和演变的内在经济联系以及区域外部空间结构组合的演化规律。这种对城市系统空间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在理论上对更新和发展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一

方面便于在城市经济学科体系中形成一以贯之的整体性核心理论分析框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建构起更具一般意义的指导地区生产力布局和规划城市区域经济体系空间组合的宏观区位理论基础。

0.2.3 论题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几点创新

(1) 在研究内容方面

在劳动地域分工理论的基础上，以产业与贸易为主线逻辑一致地揭示了在城市产生、成长和扩张的生命周期过程中，城市外部空间的结构运动。

在产业市场结构特征分析的基础上，以产业贸易网络揭示由城市外部空间结构反映的城市职能结构、规模结构及布局形态。

以主导产业的非均衡空间扩散，对城市主要经济联系方向的改变来揭示城市外部空间结构的动态演变路径。

运用增长要素的结构差异方法，从经济学角度对城市经济一体化区域作出了比较明确的空间界定。

在对城市区域化的分析中，引入新制度学派的交易分工理论，从而将产业与经济组织的空间现象及空间运动与经济形态的演变有机地结合起来。

(2) 在研究方法方面

以产业与贸易角度研究城市宏观层次的外部空间结构形成与演变机制，揭示了城市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

②将域际贸易机制纳入地域劳动分工理论体系，建构了一般区位论原理，是对古典区位理论体系的动态化和宏观化。

将城市作为一种历史积累的空间结果纳入分析框架，运用历史分析方法揭示城市经济的空间结构组合演化规律。

在基础理论部分对外部空间结构形成和演变的机理研究以及域际产业贸易链、经济区域的交易边界界定等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广泛运用经济学的模型研究方法提高了全文理论基础的规范性和解释性。在之后的实证研究中运用统计分析方法以提高实证分析的可靠性和说理程度。

0.3 本书的篇章布局和写作结构

城市外部空间运动理论是经济学体系中空间经济领域的一个分支研究。在理论层次上，是介于空间经济学微观区位理论和宏观布局理论系统之间的中观层次。既可以看做是区域理论的微观基础，也可视为是对区位理论的宏观演绎。

在篇章布局上，全书由理论篇和实证篇两个部分构成。前者旨在对城市外部空间的结构形成和演变机理及其结构模式进行基础理论研究；后者重在在我国抽取具有典型意义的城市区域进行实证研究以考察理论研究部分基本结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其中，基础理论部分建立了全书的研究框架，旨在逻辑严密地建构对研究对象空间运动的机理研究；实证部分是对机理研究的实验描述，旨在为理论铺陈寻找实践佐证。两者相辅成为整体。基于本书是关于经济实践中空间运动的一项解释性理论的研究性质，因此，全书有较多的篇幅侧重于关于机理研究的基础部分。基础理论部分共包括 7 章。第 1 章是从文献综述的角度，对关涉城市外部空间运动研究的几个基本概念范畴进行代表性的理论观点阐释和归纳。第 2 章是机理研究的逻辑起点，本章旨在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城市产生的经济机制。第 3 章将在理论的基础上，主要考察自增强机制对城市地域劳动分工体系产生的直接影响，从而导致城市空间成长的空间运动

过程。第 4 章是对空间结构形成机理的理论研究。第 5 章的分析包含两个层次，首先，建构了两个关于界定城市外部主导经济联系方向和主导联系路径的经济模型。并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进而，本章在对城市外部产业贸易链的外部经济根源的论证基础上，通过产业关联空间外部性模型的一般化，对城市域际主导产业贸易链的确定、形态以及空间效应等进行了经济学的论证与研究。第 6 章首先从理论层面研究了经济增长与区域分化的决定关系，将关于区域空间边界的确定理论具体化。分别对资本、劳动和技术等不同生产要素的交易边界问题进行探讨。最后，运用职能分类标准研究了在经济区中中心职能城市的确定方法，并通过中心城市与经济区内其他城市的交易关联所产生的物流分析，描述了中心城市与城市经济区空间运行的关系以及城市经济区空间结构的具体形态。第 7 章主要研究主导产业的更替与城市外部空间结构演变之间的关系。

第 8 章至第 11 章是论文的实证研究部分。第 8 章选择了以京—津为双核心的环渤海城市经济区域为典型，来实证产业贸易机理对城市经济区域外部空间形成和结构演变等空间运动现象的决定作用。这是基于：首先，京津城市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地区代表，因此能够较完整的概括各类不同要素形态主导产业贸易关联以及具体的关联传导机制对城市外部空间运动的全部过程。其次，在空间形态上，京—津城市经济区是中国最为典型的双核型区域，其空间联结的紧密程度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讲，特例是常规的高度概括。因此，作此选择可以一石两鸟。既可将两核心城市之间的经济耦合看做是对其他不同城市之间经济关联规律性的概括，也可通过双核心较强的扩散势能，更为明晰的综合由扩散和回流组合成的地域经济联系对城市外部空间运动的决定和影

响作用。在具体的分析中，本章对京津经济区双核心形成的经济与历史背景、双核之间的贸易联系机制及主导产业贸易链的形成以及向核心外部的空间传导机制和空间结构演变规律等机理作用都做了实证性研究。第 11 章选择以上海为中心城市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对城市外部空间结构运动的另一个实证对象。这是因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区域是我国经济规模最大、城市分布最为密集、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具有举足轻重的实践意义。在本章的实证分析中，首先对上海成为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的自然因素、经济和历史背景条件进行描述。在此基础上，对上海中心城市外部空间结构的特征和结构运动进行了翔实的实证描述。并进一步对导致上述城市外部空间结构运动的产业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在第 10 章中将珠江三角洲列为实证研究对象。这是因为珠三角不仅具有前述两个城市经济区所体现出的共性特征，而且它还具有经济外向性强和自下而上组织城市化等特殊性和特殊性。因此珠江三角洲城市区域的内部经济关系对研究区域空间结构运动具有很好的典型意义。最末一章，也就是本书的第 11 章在时间上将城市区域空间结构的研究延伸至信息经济时代，本章再次以首都北京为实证对象前瞻性的考察在新经济运行模式逐渐确立的社会背景下，城市区域空间结构的未来演变趋向。力求以本章得出的基本理论假说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未来区域空间发展的思路和框架，并借以实现本书理论研究体系的完整性。

理 论 篇